Globethics Repository



哲學與反哲學——沃格林論政治的諾斯替主義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ZHANG, Xinzhang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08 07:07:58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943

哲學與反哲學*

——沃格林論政治的諾斯替主義

張新樟
浙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浙江大學外國哲學博士

對於現代政治的諾斯替主義的大量描寫是政治哲學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首要主題。在一九五二年發表的《新政治科學》（*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以及後來的許多著作，如《科學、政治和諾斯替主義》（*Science, Politics and Gnosticism*）中，沃格林把現代性的本質定義爲「諾斯替主義的成長」。他把諾斯替主義理解爲「對這個世界感到陌生的一種體驗……對於存在的恐懼感和從中逃脫的願望」。沃格林認爲，與古代的非歷史性的、來自於上方的拯救不同，現代諾斯替主義寄拯救的希望於未來，是通過歷史過程實現的。沃格林描繪的政治的諾斯替主義是一種解決現世之疾病與罪惡的努力，期望一個革命性的全新的王國的到來。基於這種激進的內在拯救論，沃格林批評十八世紀，尤其對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和伏爾泰（Voltaire）頗多微詞。接着，沃格林像《聖經》預言家那樣歷數現代諾斯替主義：「新宗教實證主義的最高級祭祀」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黑格爾主義

* 此文乃張新樟博士於二〇〇二年十月至二〇〇三年一月到訪敝所，出任訪問學人期間之研究成果。——編注

（Hegelianism）[1]、「人的自我拯救，一場理智的騙局」馬克思主義；「左翼諾斯替主義」共產主義、「諾斯替主義尋求世俗神學的終點」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科學主義和經由物理、經濟、社會學、生物學和心理學等各種途徑獲得拯救的內在論者的自負」等，最主要的現代諾斯替主義者包括約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莫爾（Thomas More）、加爾文、霍布斯（Thomas Hobbes）、黑格爾、孔德、馬克思、尼采、海德格爾和希特勒（Adolf Hitler）。[2]沃格林把所有這些都稱爲諾斯替主義，他呼籲「制止諾斯替主義的墮落，重新恢復文明的力量」。

沃格林的觀點在政治科學領域內外都發生了重大影響，各個領域的學者們聚集在「諾斯替主義和現代性」之類的學術會議上，甚至討論諸如「林肯政治辭令中的諾斯替主義」之類的論題。

沃格林的《科學、政治和諾斯替主義》[3]自從於一九五九年首次以德文發表，隨後又於一九六八年勒涅里（Henry Regnery）出版社出版了它的譯文之後，就已經成爲現代政治理論的一部經典。它充分展示了沃格林的思想力量，其表達極其清晰，對現代存在中的諾斯替主義性質作了獨一無二的富有說服力的分析。這部著作旨在顯示：受惠於古典哲學與基督教哲學的新政治科學可以用於診斷當代政治存在中的疾病，並在理智與科學的適度的範圍內提供治療方案。這本書擴展並深化了《新政治科學》後一部分的主題，即「現代性的本質是諾斯替主義」。它還繼續展現了

1. 早在一八三五年鮑爾（Ferdinand Christian Baur）就已經論證過德國唯心主義和諾斯替主義之間的相似性，把它稱爲「宗教哲學，神通過人發展出自我知識」。
2. Eric Voegelin，《科學、政治和諾斯替主義》（*Science, Politics and Gnosticism*; Regnery Publishing, Inc., 1968, reprint 1997），頁 10。
3. 我們採用的版本是勒涅里出版社一九六八年版，一九七七年重印本。

扎根於日常的體驗之中，並且運用了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方法的「新科學」。亞里士多德的方法的核心乃是沃格林哲學的巨大力量所在。他從對於既定問題的最平常的理解開始，然後上升到分析性的體驗，澄清每個人都共有的有關實在的關鍵體驗，通過這種澄清使得具有哲學氣質和理性能力的人成爲他的探索眞理的同道。該著作的第一部分最初是作爲慕尼黑大學政治科學教授的就職演說發表的，出色地討論了人類生存的現代危機。雖然沃格林的目標是批判、治療現代政治的諾斯替主義，但是他對現代政治的諾斯替主義本身的分析和闡述是相當精闢的，我們在本文中要解讀沃格林《科學、政治和諾斯替主義》對政治的諾斯替主義的批判，以此爲支點來觀照政治的諾斯替主義的主要表現及其特徵。

一、古今諾斯替主義的歷史延續性

「諾斯替主義」（Gnosticism）是一個現代術語，來源於希臘詞 gnostikos（即 knower，指一個擁有諾斯 gnosis，或「密傳知識」的人），用於指稱寓於希臘化晚期大規模混合主義宗教運動之中的共同精神原則。諾斯替主義普遍地體現在當時的新柏拉圖主義、斐洛主義、猶太教、神秘宗教等所有的哲學與宗教派別之中。尤其在基督教中，它找到了自己的永久的棲身之所，形成教父學（Patristics）中稱之爲基督教異端的諾斯替派。諾斯替主義者也會從這些既存的哲學宗教派別中獨立出來，形成自己的派別。這些獨立的諾斯替派別以及作爲基督教異端的諾斯替派是諾斯替主義精神原則的最集中、最典型的體現。

古代諾斯替主義的開端與結束都沒有確切的時間。諾斯替主義的教派歷史是古代晚期宗教研究中最困難的課題

之一，這一方面是由於資料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是由於諾斯替派一般對歷史不感興趣，除非這歷史與拯救史有些關係，這是由他們對世界的輕視態度決定的。到目前爲止，我們沒有發現諾斯替派自己寫的史書，可以像路加寫的《使徒行傳》或歐西庇烏（Eusebius）寫的《教會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那樣幫助我們確定諾斯替主義的歷史。但我們基本可以確定它的出現大約是在基督教時代，而消失大約在第六世紀（就西方的跡象而言），但它從未徹底滅絕，中世紀的時候出沒在今天的東南歐一帶，並向西移動，引發了一些新的教派運動，如保羅教派（Paulicians）、鮑格米勒派（Bogomil）和卡特里派（Catharists，或稱「潔淨派」）。諾斯替的學派除了摩尼教之外都沒有形成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這是其狹隘的秘傳性以及對於世界的過分仇視。諾斯替主義教派的消失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基督教的得勢。基督教能夠適應環境，把諾斯替神學的合理關懷接納進其日益鞏固的教義體系之中，發展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意識形態與社會結構，從而成爲古代宗教運動的繼承者。基督教避免了極端化，緩和了早期基督教信息的激進性，形成可爲世界所接受的形式，它不只是抵制而且還接受古代的文化遺產，因而日益地削弱了諾斯替主義的影響力，最後於第四世紀獲得了國家權力的支持來對付諾斯替派。與這個過程對應的是諾斯替教義的內在的停滯狀態，然而由諾斯替派提出來的惡的起源、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創造與拯救之間的關係、知識的作用、靈與肉的關係等等問題，被保留在基督教神學的思考之中，在後來的教會史中一再地成爲破壞性的力量。正如布盧門貝格（Hans Blumenberg）所說：「基督教第一世紀的諾斯替創傷比對他們的血腥迫害還要

深。」[4]我們可以說，諾斯替主義如影子般地跟隨着教會，教會永遠無法克服它，它的影響實在是太深了。由於他們的共同歷史，他們始終既是敵人又是姐妹。

這就提出了諾斯替主義超乎其具體歷史存在之外的歷史影響問題。這可以從不同途徑、不同方式中加以追溯：一方面，諾斯替主義的問題被基督教神學所接受，甚至它的立場也保留在基督教神學之中；另一方面，諾斯替主義觀念與傳統以某種改頭換面的形式出現在變化了的社會與歷史場境之中；最後，諾斯替主義觀念與體系有意無意地被現代的混合主義神智學派所接受。但是所有這些不同途徑都很難追溯其延續性的具體情節，因爲各種聯繫的環節通常是一些「潛在」的渠道，或者這些聯繫是建立在哲學史領域中所進行的觀念史的重新建構的基礎之上的。鮑爾在他的專著《基督教諾斯替主義：或者其歷史發展中的基督教宗教哲學》（*Die christliche Gnosis oder die christliche Religionsphilosophie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中不僅討論了早期基督教「宗教哲學」中的反諾斯替主義的代表，而且也極盡詳細地論述了「古代諾斯替主義與更後來的宗教哲學」，把伯麥（Jakob Böhme）、謝林（F. W. J. Schelling）、施來爾馬赫（F. D. E. Schleiermacher），尤其把黑格爾說成是諾斯替主義的後裔。[5]

沃格林服膺鮑爾的見解，認爲鮑爾的著作並非一個孤立的事件，它是對一百餘年來的異端歷史研究的一個總結，當時的學術界公認，諾斯替主義通過啓蒙運動和德國

4. Blumenberg，《世俗化與自我堅持》（*Sakularisierung und Selbstbehauptung*; Frankfurt am Main, 1974），卷二，頁 144，轉引自 Kurt Rudolph，《諾斯：諾斯替主義的性質與歷史》（*Gnosis: The Nature & History of Gnosticism*; Harper & Row, 1987），頁 368。
5. Ferdinand Christian Baur，《基督教諾斯替主義：或者其歷史發展中的基督教宗教哲學》（*Die christliche Gnosis oder die christliche Religionsphilosophie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Tübingen, 1935）。

的唯心主義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在鮑爾、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加繆（Albert Camus）、陶貝斯（Jakob Taubes）、柯亨（Norman Cohn）、呂巴克（Henri de Lubac）等人的研究基礎上，沃格林把現代意識形態的群眾運動以及主導地位的「哲學」學派看成是古代各種反基督教的諾斯替教派的延續。他說：「我們愈是了解古代的諾斯替主義，就愈確信現代的許多思想運動，諸如進步主義、實證主義、黑格爾主義、馬克思主義等，乃是諾斯替主義的變種。」[6]他認爲，在古代諾斯替主義運動與現代的的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主義、存在主義、進步主義、烏托邦、革命激進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民族社會主義等等「主義」之類的現象之間既有歷史延續性又有體驗上的相似性。沃格林還認爲，美國的詹姆斯（William James）早在二十世紀就看清了他所提到的這些運動的諾斯替主義性質，知道黑格爾的思辨乃是現代諾斯替主義的頂峰，只不過，他的批判性的反對幾乎沒有甚麼影響。沃格林說，各種諾斯替類型的理智運動如今也同樣主宰了美國的公共舞台。一個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上帝之死」運動。上帝之死乃是諾斯替主義的核心問題，古今諾斯替主義都是如此。從黑格爾到尼采，它是諾斯替思辨的大主題，而自黑格爾時代以來，新教神學也受它的困擾。在最近幾年，它又被那些面對城市化和異化的迫切問題的神學家們所接受。沃格林認爲，被諾斯替主義打亂的個人與社會秩序問題都沒有得到成功的解決，因爲解決這些問題所需要的哲學知識本身也被這種盛行的理智風氣所摧毀。與諾斯替主義的後果所作的鬥爭都是以諾斯替主義的語言來進行的。

6. Voegelin，《科學、政治和諾斯替主義》，同前，頁 xix。

二、古今諾斯替主義在體驗上的聯繫及現代政治的諾斯替主義的特徵

在大量的學術研究追溯歷史源淵之外，沃格林也進行了體驗上的分析。沃格林提到：「象徵性表達的相似性確證了古今諾斯替主義在態度與動機上的根本相同。」[7]古今諾斯替主義在體驗上所共同的主要是相互聯繫的兩種體驗：異在於一個敵意的世界，反叛存在的神聖基礎。

沃格林對於古代諾斯替主義的理解可以概括爲如下幾個要點：

一、希臘化時期東方古代帝國的崩潰，以色列、希臘和腓尼基城邦獨立地位的喪失，人口的流動，放逐和囚禁，以及各種文化之間的交融，把這些無法主宰歷史進程的人們逼進一種極端孤獨絕望的境地，感受到世界的動盪、思想的混亂、精神和物質的不安。由制度、文明和種族凝聚力的崩潰所導致的意義的喪失召喚人們作出各種努力，要重新理解在一個既定處境之中的人生意義。在這些洞見的深刻程度上是各不相同的眾多努力之中，對於人類生存意義的最宏大規模的重塑屬於諾斯替主義。

二、在豐富的諾斯替體驗及其象徵性表達之中，其中有一特徵可以作爲廣泛的意義重塑中的一個核心因素：把世界體驗爲一個人迷失在其中的異鄉，人們必須找到回到他所從來的那個世界的道路。「是誰把我扔入到這個受苦的世界？」諾斯替文本中的「偉大生命」這樣問，他是這個世界中的異鄉人，這個世界對於他來說是異鄉。「這個世界不是按照生命的願望造就的。」「你到這兒來不是出於偉大生命的意志。」因此就有這樣的發問：「是誰把我帶到了這個邪惡的黑暗之中？」也有這樣的懇求：「把我

7. 同上，頁 40。

從黑暗的世界中拯救出來，回到那個我所從墮落的世界中去吧。」這個世界不再是秩序井然的世界，不再是希臘人以之爲家園的那個宇宙；它也不是猶太－基督教的神創造的那個好的世界。諾斯替的人不再懷着敬仰之情去洞見宇宙的內在秩序。對於他來說，這個世界已經成了他想要逃脫的一個監獄：「那可憐的靈魂迷失在這個苦難的迷宮之中，到處流浪找不到出路……他想逃脫這個痛苦的混沌，但是他不知道如何逃脫。」因此，偉大的生命發出困惑而哀傷的問題：「爲甚麼你要創造這個世界，爲甚麼你把你的族類安置在這個地方？」[8]

三、從這種態度之中產生出了諾斯替主義的綱領性的表達式：「諾斯就是這樣的知識，也就是知道我們曾經是誰，現在成了甚麼，我們曾經在何方，現在又墮落到了何方，我們去向何方，我們在何處被拯救，甚麼是生，甚麼是重生。」大的諾斯替主義思辨神話就是圍繞着人的起源、目前墮落的處境、逃脫此世，以及拯救的意義等問題演繹出來的。如果人要從這個世界中被拯救出來，其拯救的可能性首先必須建立在存在的秩序之上。在古代諾斯替主義的本體論中，這是通過對於一個「陌生的」、「隱蔽的」神的信仰來實現的，這位陌生的神是來幫助人的，帶給人他的信息，給人指示逃脫此世之惡神的道路（惡神可以是宙斯、耶和華，或者一個其他的古代父神）。在這個本體論的可能性的基礎之上，諾斯替主義者必須自己來執行拯救的任務。他目前是通過他的魂而從屬於這個世界的秩序（也即律法）的；促使他擺脫律法控制的乃是他的靈。於是，拯救的工作要求消解此世的屬魂的世俗律法，同時聚

8. 沃格林引自曼達派的《密藏》，見：M. Lidzbarski 譯，《密藏》（*Ginza. Der Schatz oder das Grosse Buch der Mandaer*; Göttingen, 1925）。

集並解放靈的能量。儘管不同的派別和體系關於拯救的階段有不同的表述，它們有着神秘修行和巫術、漫不經心的縱慾主義和極其嚴格的禁慾主義等等的不同，它們的目標總是相同的，就是要摧毀舊世界，進入到一個新世界。拯救的工具就是諾斯本身——就是知識。按照諾斯替主義的本體論，人之所以陷入到這個世界之中乃是由於無知所導致的後果，因此靈魂可以借助對自身眞正生命的知識，以及對自身流落異鄉處境的知識而擺脫這個世界。知識可以幫助人了解自己受縛於這個世界的處境，它同時也是幫助人逃脫這個世界的手段。因此，伊里奈烏（Irenaeus）復述了諾斯對於瓦侖廷主義者（Valentinians）[9]的意義：

> 完美的拯救在於對無法言傳的「偉大」的認識。既然缺陷和痛苦都是源於無知，那麼無知形成的整個體系都會被知識所瓦解；因此知識就是對內在的人的拯救。這種拯救不是物質性的，也不是靈魂性的，而是靈性的，因為他們認為內在的靈性的人是通過知識而得以拯救的，由於他們已經獲得了關於萬物的知識，他們就不再需要任何另外的東西了。這就是真正的拯救。[10]

從第一、第二個要點之中，我們可以辨認出黑格爾的異化思想和海德格爾所說的人的沉淪。相類似的象徵表達來自於相類似的對於世界的體驗。而且這種類似性不只是局限於對世界的體驗，古今諾斯替主義關於人的形象，以及回應異在世界中的沉淪處境的拯救之途也是類似的。如上述第三個要點，古代諾斯替主義的拯救可能性是通過在

9. 瓦侖廷派是二世紀影響最大、最有影響力的諾斯替教派，一直存在到四世紀。
10. Irenaeus，《反異端》（*Against Heresies*），卷一，第二十一章，第 4 節。

本體論上假定一個超陌生的神來實現的，而現代諾斯替主義則類似地通過假定絕對精神來實現，這個絕對精神在意識的辯證展開中，從異化進展到它自身的意識；或者是通過假定自然的物質辯證過程來實現的，這個物質辯證過程從由私有財產導致的異化處境進入到人的充分自由的存在；或者通過假定自然的意志來實現的，這個自然的意志會把人塑造成超人。現代諾斯替主義者和諾斯替主義運動有六個共同的特徵，沃格林稱之爲「諾斯替態度」：對這個世界的不滿、相信這個世界的疾病來自於它的組織方式，確信改良是可能的，假定改良是歷史性演化的，相信人類能夠改變這個世界，相信知識是改變世界的關鍵。[11]

現代諾斯替主義的主要特徵是：一、改造世界的內在論的計劃；二、無神論和隨着上帝之死而來的人的神化爲超人、自然的主宰、歷史的創造者。現代諾斯替主義相對於古代諾斯替主義的一個尤其明顯的區別在於：它放棄了垂直向度的或者說彼岸向度的超驗，而宣稱「水平向度的」超驗或者說世界之內的拯救教義爲終極眞理。現代諾斯替主義於是呈現爲對於歷史意義的思辨，把歷史視爲一個由革命的精英操控的封閉的過程，這些精英懂得歷史一步步走向完美境地的道路、過程和目標（黑格爾、馬克思、孔德、民族社會主義）。這種實在的極端內在化或世俗化意味着有關實在的問題是一切其他問題的根本。這個事實導致沃格林運用「第二實在」這個象徵，即諾斯替思想的空想家們構造的夢想世界，他們通過禁止提問而向神聖存在封閉或排斥實在的某些令人煩惱的方面，從而改變了人們平常所體驗到的關於實在的意識。沃格林在一個著名的段落中說：

11. Voegelin，《科學、政治和諾斯替主義》，同前，頁 86-88。

> 末世論諾斯替主義的目標〔如在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爾那裏〕是要摧毀有缺陷的、不公正的存在之秩序，依靠人的創造性力量建立一個完美公正的秩序。然而，無任我們如何來體驗存在之秩序——近東文明把它體驗為一個由宇宙性神聖能量所主宰的世界，猶太－基督教象徵中把它體驗為一個超世界的神的創造物，哲學冥想把它體驗為存在本身的秩序——它始終都是某種既定的東西，是不受人控制的。因此，為了使創造新秩序的努力看起來有合理性，就不得不忘卻存在秩序之既定性；存在之秩序必須解釋為是完全在人控制之下的東西。而控制存在則進一步要求忘卻存在的超驗的起源；它要求砍去存在之頭——就是謀殺上帝。[12]

基督之釘十字架，猶如黑格爾思想中的謀殺上帝，不是辯證論者的一個事件，而是辯證論者的一個功績。「對於眞哲學家而言，存在之秩序乃是某種既定的東西，然而在諾斯替主義之中，存在之秩序的本質被系統化地構建爲一個意識階段的序列，隨辯證發展而沿續……神已經死了，因爲他只不過是意識的一個階段，現在業已過時……精神作爲體系要求謀殺上帝；反過來，體系正是爲了謀殺上帝而構建起來的。」[13]

莫爾、霍布斯、黑格爾的還原論、改造世界、意識形態體系的構造在〈代宗教〉（Ersatz Religion）[14]這篇文章中得到了清晰的勾勒。沃格林的這篇文章主要總結和闡述了《新政治科學》第四章中的論證。在確認諾斯替主義的主要特徵時，沃格林強調：「對於改造存在的方法的知

12. 同上，頁 35-36。
13. 同上，頁 46-48。
14. 同上，頁 57-78。

識——諾斯——是諾斯替主義者的最大關懷。」[15]

三、哲學與諾斯替主義的對立

沃格林《科學、政治和諾斯替主義》演說的背景就是哲學家對於眞理的追求以及他個人對於各種形式的非眞理的拒斥，尤其是對那些影響了政治局勢的非眞理的關注給予了他的哲學活動以動力。沃格林的演說之中沒有自命不凡的東西。因爲沃格林相信哲學家的使命與任何其他人的使命有許多共同之處，他在演說辭的一個前面的段落中表達了這個信念。正如他的主要的哲學導師柏拉圖所認爲的那樣，哲學家只不過是一個模範的人，不是一個特立獨行的族類。因此，在這個嚴肅的場合，沃格林聲明，他的演說的主題和眞理是適用於在場的每一個人乃至於預期之中的讀者們的：

> 我們現在就要試圖通過對代表性意見的分析來表述這種禁止提問的現象。因此，我們的努力不只是要描寫這些現象，而且也要進行分析。它應當表明，我們時代大家都經常提到的精神混亂和文明危機並不是必須承受的、不可避免的命運……相反，每個人都有辦法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克服它。我們在這裏的努力不只是要指出方法，而且也要指出如何運用方法。沒有人有責任要承受社會的精神危機；相反，每個人都有責任去避免這種愚昧，讓自己生活在秩序之中。我們對於這些現象的表述同時也是為了在治療性的分析中提供治療的手段。[16]

15. 同上，頁 60。
16. 同上，頁 15。

因此，他稱哲學家爲治療靈魂的醫生。有一位評論家思考了沃格林哲學活動的總體特徵，作出了如下的評論：

> 為了理解沃格林關於秩序與失序的哲學，有必要認識到他的哲學乃是抑惡揚善……在作為歷史學家的沃格林背後的是預言者沃格林，他疾呼：「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的人有禍了。」對既存的種種哲學的判斷乃是為從好哲學中挑出惡的哲學。在政治上強有力的形式有法西斯主義（包括納粹這種最糟糕的形式）和共產主義；退化了的或「出軌了」的現代哲學對於左派和右派集體的專制只有軟弱的抵抗。壞的形式是非常的壞，沃格林顯然沒有學術派的好風度，忍不住稱馬克思為騙子，稱黑格爾為吹牛者在玩弄「騙人的把戲」……沃格林所謂的「真的」哲學就是好的哲學。它就是古典哲學和基督教哲學，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的遺產，從中產生出了托瑪斯·阿奎那和經院主義哲學……沃格林關於真的好的哲學的觀念是如此高貴，以至於任何實踐的哲學家除了指出它是甚麼之外不敢再有另外的奢望。哲學負有把我們從惡當中拯救出來的職責，它是「對存在之愛，這種愛來自於對秩序之源的神聖存在之愛」。我稱沃格林為一個奧古斯丁主義者，因為哲學必須發展出「成對的觀念，同時闡明善與惡」。與人的城邦相對，沃格林在人的城邦之上呈現了一個上帝之城。真哲學的社會功能是為了抵抗失秩，塑造一個「歷久長存」的社會。[17]

17. Paul Grimley Kuntz，〈沃格林從秩序中體驗無序以及從無序中看到秩序〉（Voegelin's Experience of Disorder Out of Order and Vision of Order Out of Disorder），載 Ellis Sandoz 編，《沃格林在現代思想中的重要性》（*Eric Voegelin's Significance of the Modern Mind*; Baton Rouge, L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頁 115-117。Ellis Sandoz，《沃格林的革命：一個傳記式的介紹》（*The Voegelinian Revolution: A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Baton Rouge, L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1），頁 141-142。

防止哲學走向邪路乃是防止人類生存本身走向邪惡和專制之路這一更大任務中的一個關鍵。這乃是生死攸關的問題。爲了說明這一點，沃格林把諸如馬克思、孔德和黑格爾這樣的大哲學家與奧斯維辛（Auschwitz）集中營的司令霍斯（Rudolf Hoss）相提並論。納粹黨衛隊的軍官是不會提問的，他們甚至根本不會想到質疑他們的命令。霍斯說：「像那一類的事根本就不可能。」沃格林認爲，這種措辭與馬克思的措辭很接近，「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像這樣的問題在實踐上根本就不可能，只是抽象的問題」。

沃格林所謂的眞理與非眞理之對立乃是哲學與表現爲諾斯替主義的反哲學之間的對立。他說：「基於這些前人和本人的《新政治科學》所獲得的洞見，《科學、政治和諾斯替主義》這份於一九八五年在慕尼黑大學發表的演講稿試圖把諾斯替主義運用於黑格爾、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爾，並且更加清楚地分清政治的諾斯替主義與政治的哲學之間的界限。」[18]那麼，這兩者之間的衝突何在呢？沃格林陳述了如下兩個原則：「哲學來自於對實在之愛；它是人們爲了發現實在之秩序並適應這種秩序所作出的熱愛之情的努力。諾斯則妄想主宰實在，爲了主宰實在，諾斯替主義者構建他的體系。構建體系乃是諾斯替主義的理智形式，而不是哲學的理智形式。」[19]哲學自始至終都是對智慧的熱愛而不是智慧的佔有。向神聖實在的關閉是通過權力意志實現的，它是通過體系建構、禁止相關的質疑，以及謀殺上帝而表現爲哲學的，它在現代精神中先是召喚出自治的人，最後是構想出了所謂的超人。

18. Voegelin，《科學、政治和諾斯替主義》，同前，頁 ix。
19. 同上，頁 30。

沃格林堅持實在的穩定性和既定性，認爲政治的諾斯替主義主宰實在、改造世界的企圖乃是徒勞無功、給人類帶來災難的行爲。他認爲：唯一的實在就是體驗到的那個實在。因此，莫爾的烏托邦只有從人性中移去罪性才有可能，但莫爾自己知道這是不可能的，烏托邦主義者，乃至後來的烏托邦主義者都認爲這是不可能的。霍布斯在《利維坦》（*Leviathan*）中建立了他的體系，他把實在模糊化，拒斥了任何至善（summum bonum），而以極惡（summum malum）爲他的第一原則。黑格爾的體系只是通過玩辯證法的遊戲構建起來的——意識的展開至於歷史的終點被理解爲人的邏各斯與神聖邏各斯在黑格爾本人身上達到同一——是對於神秘的歷史的歪曲。其實，歷史乃是不可知的，它延展到一個模糊而不確定的未來。[20]

那麼哲學家們應當提供何種方案來取代這些天才的但是明顯有意犯錯的「邪惡的大膽妄爲」的諾斯替主義呢？在沃格林的敘述中，謙卑的哲學與信仰乃是用以取代妄自尊大的諾斯替學說的替代品。在分析了基督教信仰的含義之後、以及在思考猶太教、哲學和伊斯蘭教的超驗體驗之前，沃格林作了如下總結：

> 在基督教信仰中，從不確定的真理落到確定的非真理上去的誘惑要比其他靈性傳統更強烈。但是，缺乏對於實在的可靠把握以及必要的靈性緊張乃是邊界體驗的普遍特徵，在這種邊界體驗中，人對於超驗存在的知識以及世俗存在的起源和意義都得以產生。[21]

20. 沃格林與黑格爾的較量貫穿在他後來的著作之中，包括《秩序與歷史》（*Order and History*）卷五和《尋求秩序》（*In Search of Order*; Baton Rouge, 1987）。
21. Voegelin，《科學、政治和諾斯替主義》，同前，頁 75。

沃格林穩立於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奧古斯丁所預備的根基之上，反對各種各樣的「第二實在」的虛構的操縱者。「事物的本性是不能變化的；無任誰想要改變一個事物的本性，那他其實是摧毀了這個事物。人不能夠把自己改造成一個超人，試圖創造超人其實就是試圖謀殺人。」[22]基督教對於此世之不完美性的解決方案始終是開放的：「此世貫穿整個歷史都是保持原樣的……而人的拯救性的實現是通過死亡之中的恩典帶來的。」[23]「此世始終是被賦予我們時的那種樣子，它的結構的改變不在人的能力範圍之內。」[24]因此，莫爾在「他對由神創的此世的反叛中，武斷地忽略了實在的一個因素，以便創造新世界的幻想」[25]。「黑格爾把人的邏各斯與基督的邏各斯等同起來，以便使得這個富有意義的歷史過程變得完全可以理解。在莫爾、霍布斯和黑格爾這三個例子之中……思想家忽視了實在的一個關鍵的因素，以便能夠構造一個人、社會或歷史的形象來適應他的願望……然而存在的結構依然保持本來的樣子……思想家的權力慾無法觸及到它……其結果不是對於存在的宰制，而是一種虛幻的滿足。」[26]沃格林在導言中說：

> 憑藉知識進行自我拯救，這有它自身的魔力，但是這種魔力是不無害處的。存在之秩序的結構不會因為人們發現了它的缺陷並逃離它而改變。摧毀這個世界的企圖不會真的摧毀這個世界，而只會增加社會的混亂無序。諾斯替主義者逃離這個真正可怕、混亂、被壓迫的處境的努力是情有可原

22. 同上，頁 43。
23. 同上，頁 60。
24. 同上，頁 69。
25. 同上，頁 70。
26. 同上，頁 106。

的。但是古代世界的秩序可以通過愛的運動而得以恢復，那就是可以通過基督教。[27]

四、沃格林對自己觀點的修正

《科學、政治和諾斯替主義》中的這些文本都是寫成於一九六〇年前後，此後，沃格林在一九八五年去世之前的二十五年時間裏繼續思索這些問題。在爲一九七四年版的《秩序與歷史》（*Order and History*）卷四寫的導言中，他進一步地對諾斯替主義進行了體驗性分析，鞏固了這些較早著作中的理論。這本書還發展出了一個補充早期的反叛與變形理論的觀念，那就是「自我顯現的反叛」（Egophanic revolt）這個重要觀念，自我的顯現或者自我體驗到自治，這乃是現代對於存在之基礎的反叛的核心。而且，去世之後發表的《秩序和歷史》第五卷以及《尋求秩序》（*In Search of Order*, 1987）兩書中，在幾個地方實事求是地提到了諾斯替主義的問題。顯然，沃格林一直在修正和提煉他自己的洞見。正如他在《自傳性反省》（*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中的自我評論那樣：

> 自從我第一次把諾斯替主義這個術語應用於現代現象以來……我一再地修訂自己的立場。把這個範疇應用於現代的意識形態，這一點當然始終沒變。在更為完整的分析之中，還得補充考慮另外的因素。其中的一個因素就是啓示論的變種，直接源自於以色列的先知，經由保羅，在直到文藝復興為止的基督教宗派運動中形成了一個持久的部分……而且我發現，啓示論的因素與諾斯替的因素都無法完全解釋這種內在化的過程。這個因素在十五世紀後期在弗洛倫薩新

27. 同上，頁9。

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的復興中找到獨立的源頭。[28]

在一九七六年的一個有記載的談話中，沃格林又說：

> 在以英文發表的《新政治科學》中，我可能是過分地關注了諾斯替主義……我碰巧在閱讀巴爾塔薩的時候遇見了諾斯替主義的問題。但是在同時，我們已經發現，啓示論的傳統也具有同樣的重要性，還有新柏拉圖主義傳統、赫耳墨斯教（Hermetics）、巫術，等等。〔而且〕……你會發現，費濕努（Ficino）[29]的諾斯替神秘主義乃是一個恆量，自從十五世紀末以來，一直到十九世紀，在各種意識形態延續。因此我們有涉及五個或六個這樣的因素，不單單是諾斯替主義。[30]

從總體上說，沃格林認爲他沒有需要收回或糾正的觀點，只是在過了許多年之後，有許多東西需要增加。他特別提到了異化的問題，在〈不死：體驗與象徵〉（Immortality: Experience and Symbol）一文中進行了探討。[31]

繼約納斯（Hans Jonas）將諾斯替主義從思想史論題轉換爲生存論論題後，沃格林把這一轉換推進到具體的歷史哲學論題。這種轉換的意義是：諾斯替主義絕非古代一個已經過時的思想，而是人的精神的一種類型，其在現代特

28. 十五世紀末柏拉圖主義在意大利的弗羅倫薩復興，倡導者爲費濕努。Eric Voegelin，《自傳性反省》（*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ed. Ellis Sandoz, 1989; Baton Rouge, 1996），頁 66-67。
29. 費濕努（Marsilio Ficino, 1433-1499），意大利哲學家、神學家、語言學家，弗洛倫薩大教堂教士，他的有關柏拉圖和其他希臘古典著作的翻譯和評注開創了柏拉圖主義在弗洛倫薩的復興。
30. R.Eric O'Connor 編，《與沃格林對話》（*Conversation with Eric Voegelin*; Thomas More Institute, 1980），頁 149。
31. Eric Voegelin，〈不朽體驗與象徵〉（Immortality: Experience and Symbol），載《哈佛神學評論》（*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LX [July 1967]），頁 235-79。

徵是：通過體系建構、禁止質疑以及謀殺上帝而主宰實在，擺脫由虛幻的物質利益和現世福樂織成的各種圈套，追求靈命成長，乃至於成爲超人；對政治制度提出靈性與道德上的要求，不認同俗人倫理等。這種思想類型的基礎是這樣一些前提：世界在其直接的和經驗的存在和流逝上是無意義的；世界由於人類的苦難和道德的惡——自私、仇恨和不公——而正在毀滅；人被賦予的使命是改造世界和拯救世界，解決現世之疾病與罪惡，期望一個革命性的全新的王國能實現在這個世界上。沃格林認爲，哲學自始至終都是對智慧的熱愛而不是智慧的佔有，堅持實在的穩定性和既定性，認爲政治的諾斯替主義主宰實在、改造世界的企圖乃是徒勞無功、給人類帶來災難的行爲。

Philosophy and Anti-Philosophy — Eric Voegelin on Political Gnosticism

ZHANG Xinzhang
PhD, Zhejiang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Political Theory Department
Law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Political Philosopher Eric Voegelin created a vast title for the phenomena of modern political Gnosticism, claiming that the essence of modernity is the growth of Gnosticism. He understood Gnosticism as "the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as an alien place, a horror of existence and a desire to escape from it." And he defined radically immanent salvation as "anti-philosophical" modern political Gnosticism, which promised salvation in the future, tried to solve the illness and evils in this world through historical processes. Voegelin tried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which was indebted to classical and Christian philosophy, could diagnose the maladies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xistence and offer remedies. Hence it might "repress Gnostic corruption and restore the forces of civilization". Voegelin's writings have strong impacts both within and beyond the field of political science. Based on the reading of his *Science, Politics and Gnosticism*,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Voegelin's analysis and criticism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Gnosticism.